

城市与区域研究系列

中国城市贫困的 空间分异研究

◎ 袁媛 / 著



科学出版社

014032022

D669
116

城市与区域研究系列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分异研究

袁 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北航

C1720031

D669
116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形成机制和反贫困地域政策。以广州市为例,利用民政、普查和个体问卷数据,结合典型社区实地调研,得出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以贫困人口类型划分,户籍和流动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存在分异;户籍贫困人口聚居区内部存在特征分异。从贫困程度看,以绝对贫困线度量的绝对贫困状况和以教育、住房等指标综合度量的相对贫困状况,存在空间分离与重合的不同模式。正是体制和市场两种因素在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共同作用,带来不同类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居住空间、生活机会的差异,从而导致了贫困空间的特征差异。中国城市必须针对性制订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实施有效的更新规划,希望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可以在国家和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学科影响力。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地理学、城乡规划、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人员、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和城市规划、民政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分异研究 / 袁媛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3
(城市与区域研究系列)

ISBN 978-7-03-039948-9

I. 中… II. 袁… III. 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469 号

责任编辑: 朱海燕 李秋艳 / 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科印技术咨询服务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4

字数: 330 000

定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研究历来以农村贫困研究为主体。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在充分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下,城市中陷入贫困的家庭数量较少,贫困人口主要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与广大农村中较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相比,城市贫困是无足轻重的问题。90 年代中期开始,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深化引发下岗、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在社会福利改革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的背景下,以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为主体的城市户籍贫困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贫困人口大量涌现。与计划经济时期以“三无”为代表的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问题相比,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研究,引起学界和政府的持续关注。

在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分异重构的过程,各种类型的人群在不同地域聚居的格局也已形成。城市贫困人口由于迁居能力有限,已经出现在城市特定邻里集中和固化的趋势,启示地理学者需深入分析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本书借鉴国外贫困地理的理论与方法,以广州市为例,在宏观层面,系统解析户籍和外来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通过拓展贫困度量指标,在城市宏观、微观层面构建贫困空间测度和地域类型划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微观层面,深入不同类型的贫困邻里,构建地域分异机制理论,为微观层面不同类型贫困地域更新改造与规划管理提供有效对策。本书尝试构建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空间的研究体系,完善贫困地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旨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引导社会资源公平配置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表明,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以贫困人口类型划分,户籍和外来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存在分异;户籍贫困人口聚居区内部存在特征分异。从贫困程度看,以绝对贫困线度量的绝对贫困状况和以教育、住房等指标综合度量的相对贫困状况,存在空间分离与重合的不同模式。正是体制和市场两种因素在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共同作用,带来不同类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居住空间、生活机会的差异,从而导致贫困空间的特征差异。而中国城市特有的现象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贫困的空间表征和形成原因。在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基础上,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实施有效的更新规划,希望人文地理学和

城乡规划学可以在国家和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学科影响力。

本书分为六章。

第一章把国内外文献放到“过程-互动-行动”的框架下，分为城市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阶层聚居区两个层次来述评，发现尚存总体上缺乏城市贫困研究的理论构建的问题；多为人口阶层研究和经济测度，缺少空间测度和空间分析；微观层面聚居区发展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研究不足。

第二章构建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框架，提出空间分异的理论假设，包括户籍和流动两类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集聚空间的分异，户籍贫困人口内部的特征分异和集聚空间差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分异。研究设计中分解为若干科学问题，界定宏观和微观两个研究层面，确定各个层面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时段。

第三章针对广州户籍人口贫困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回顾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上，总结转型期广州市户籍人口贫困问题特征。然后借鉴国外城市多重剥夺研究，拓展综合贫困指标，并进行空间测度，把城市贫困问题转化到不同层面的城市空间中：宏观和中观层面纵向分析十年间大都市范围不同圈层的城市贫困总量变化、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和相对集聚变化；再分析一个时间断点上各类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主要街道的综合贫困指标进行主成分、主因子分析，计算综合贫困得分，得出城市综合贫困空间结构；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分析，划分贫困空间地域类型；解释贫困空间结构和地域类型演化、分异的形成机制。最后在三种代表类型中选择典型聚居区，在微观层面分析聚居区发展变迁历程和主体致贫原因，进一步阐释地域分异的机制理论。

第四章是针对广州流动人口贫困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回顾流动人口贫困产生背景的基础上，探讨流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和形成原因。然后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分析 1990~2000 年大都市范围不同圈层、内城街道层面流动人口总量变化、空间分布和相对集聚变化，探究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微观层面选择位于城市三种区位的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空间特征，探讨贫困发生率，分析个体致贫原因，并与城市户籍人口进行比较分析住房选择和聚居的影响因素。

第五章是城市贫困空间优化与规划应对：首先预测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发展趋势，回顾保障房项目发展历程、存在问题。然后，在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和更新规划理论阐释基础上，针对不同贫困阶层聚居区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地域更新改善的规划建议。

第六章总结本书的六条主要结论。

我从 2003 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一直关注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本书是

我10年来的成果总结,主要基于以下三项研究:2006年在中山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2009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完成的博士后研究——城市贫困社区规划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全额资助博士后项目,批准号:留金出2007~3035)、2010年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机制和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40701049)。同时,本书也与我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紧密相关,它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大城市社会剥夺的地域类型、邻里影响和形成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41071106)、广东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广东省城市社会空间评价与规划运用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B0703001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剥夺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评价与规划应用(项目批准号:11lgpy101)。

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学强教授,许老师循循善诱,引导我这个工科背景的学生一步步走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学术思维和平易近人的品格值得我终生学习。同时,衷心感谢我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吴缚龙教授,他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引导我走上规范的英文学术写作之路。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众多同行学者、同事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张蓉师姐,以及广州市民政局、天河区民政局、越秀区(及东山区)民政局、荔湾区(及芳村区)民政局、白云区民政局、海珠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的工作人员对本书资料收集和调研访谈工作的大力支持。

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生活和工作永远的动力,养育之恩一生都无法回报,仅以此书献给一直为我操心 and 操劳的父母!

袁媛

2013年7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城市贫困研究述评	(7)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41)
第二章 城市贫困空间的研究体系	(42)
第一节 城市贫困空间的研究框架	(42)
第二节 城市贫困空间分异的假设	(44)
第三节 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	(52)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	(55)
第三章 广州市户籍人口的贫困问题和空间研究	(63)
第一节 转型时期城市户籍贫困问题	(63)
第二节 城市绝对贫困空间演变和分布特征	(75)
第三节 城市剥夺(相对贫困)空间分布和地域类型	(89)
第四节 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空间模式	(101)
第五节 城市贫困阶层聚居区案例研究	(110)
第四章 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和空间研究	(137)
第一节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贫困问题	(137)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和演变特征	(146)
第三节 流动人口聚居区案例研究	(156)
第五章 城市贫困空间发展趋势与规划应对	(174)
第一节 贫困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174)
第二节 为贫困和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	(178)
第三节 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和更新规划	(193)
第六章 结论	(208)
参考文献	(21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 城市贫困取代农村贫困成为重点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研究历来以农村贫困研究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有 2.5 亿,到 2005 年不足 3000 万;贫困发生率从 30% 多降到不足 5% (图 1.1、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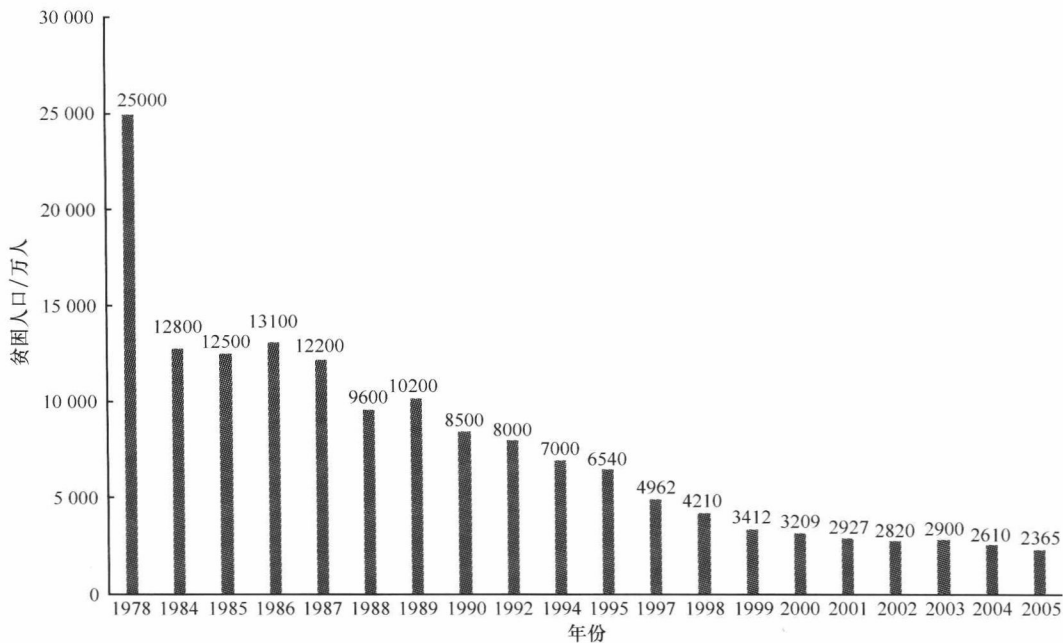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主要年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根据“中国主要年份农村居民贫困情况统计(1978~2005)”绘制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城市居民贫富分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居民陷入贫困境况。与计划经济时期普遍低收入水平下以“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无子女)为主体的小规模、低增长的贫困状况相比,社会经济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来源广泛,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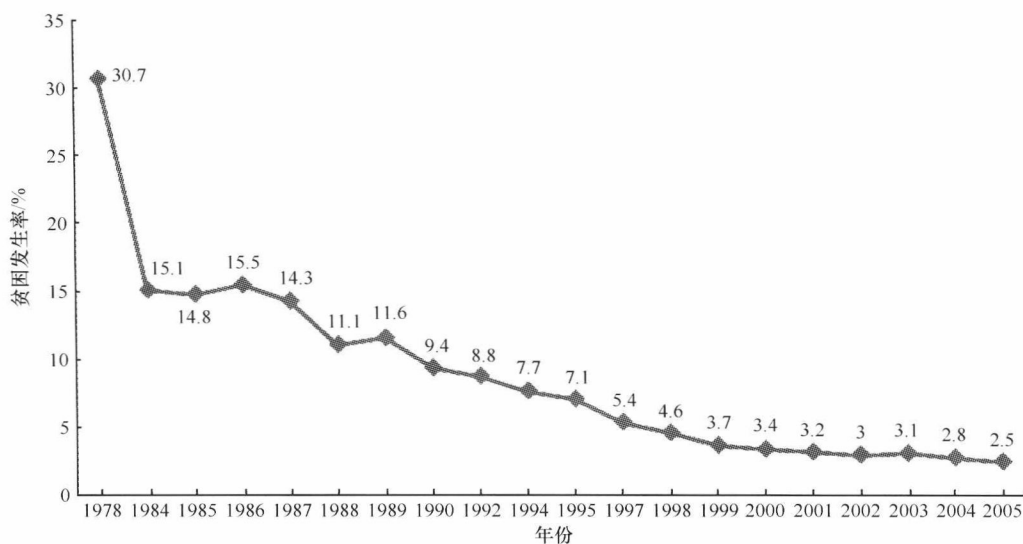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主要年份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根据“中国主要年份农村居民贫困情况统计（1978~2005）”绘制

量增多，涉及面大，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特别的关注，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

（二）城市户籍贫困人口规模增加，构成复杂

中国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各个城市的财政状况不同，建立全国统一的“城市贫困线”比较困难。1997年，全国开始推行最低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低保线”代表了各城市的“绝对贫困线”标准。有的城市采用恩格尔定律法计算，有的城市以平均工资的20%~30%为基准（吴碧英，2004）。《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享受低保的人数逐年增加，1997年为87.9万人，2006年为2240.1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3.9%，平均保障水平分别为169.6元/（人·月）、2035元/（人·年）；保障水平最高的深圳市为4128元，最低的绥化市只有1248元。低保人口增长率有两个高峰期，分别是1998年和2001年，2001年以后增长率逐年下降，2005年开始维持在0.3%左右，2008年以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图1.3）。

应该指出，以“低保线”为统计口径偏小，一方面只涵盖城市户籍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另一方面，即使按照各地现行的低保线计算，实际得到保障的人数也明显低于应当保障的人数。很多学者根据已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贫困的规模进行估计，绝对贫困人口数从1500万到5000万不等，城市贫困发生率从5%左右到15%（关信平，1999）。

城市户籍贫困人口是指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之内的人员，按照民政部门统计口径包括“三无”人员、下岗人员、失业人员、退休人员、在业低收入者、其他人员（无业、失去土地后农转非的本地城郊农民等），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本地城市户籍。其中，“三无”人员是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的贫困人口，总量少，增长率低；后五种是社会经济转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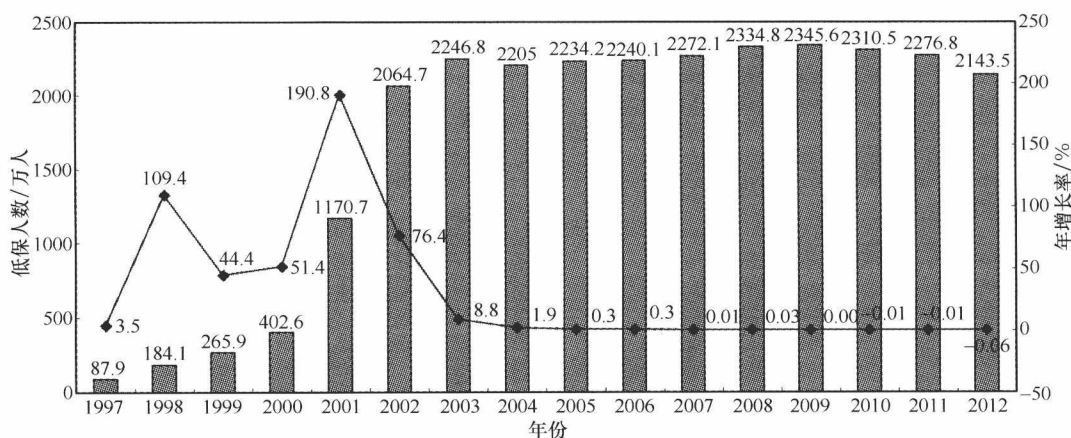


图 1.3 全国城市最低保障人数和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民政部统计数据，1997~2012年。http://cws.mca.gov.cn

新增的类型，新增人口是目前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2007年第四季度全国城市低保人员的身份构成中，“三无”人员仅占4%，新增类型占96%（图1.4）。以单个城市广州为例，1997~2003年，传统贫困人口总量保持在1000~1700人，而传统和新增贫困人口比例从1997年的1:2.8急剧上升为2003年的1:18.3，2003年传统贫困人口仅占总贫困人口的5%，2009年以后传统贫困人口数量微增，比例仍然维持在5%~8%（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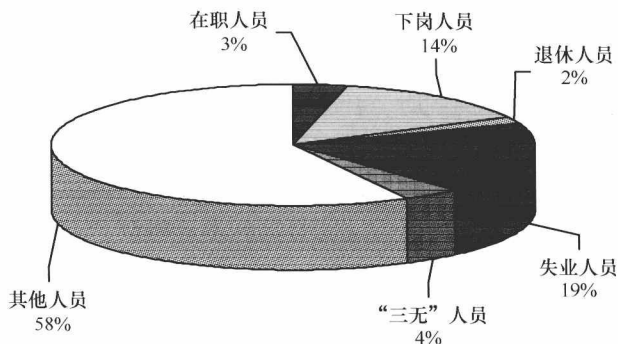


图 1.4 2007年第四季度城市最低保障人员的身份构成

资料来源：民政部统计数据，2007。http://cws.mca.gov.cn

（三）城市流动贫困人口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流动贫困人口是指在城市内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本地户籍，不在城市社会救济体系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务工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2007年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亿~1.4亿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6~40岁，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0%左右。如果用农村的生活水准去衡量，他们的收入或许并不低；如果用城市低保标准去衡量，他们或许不是绝对贫困人口。但是农民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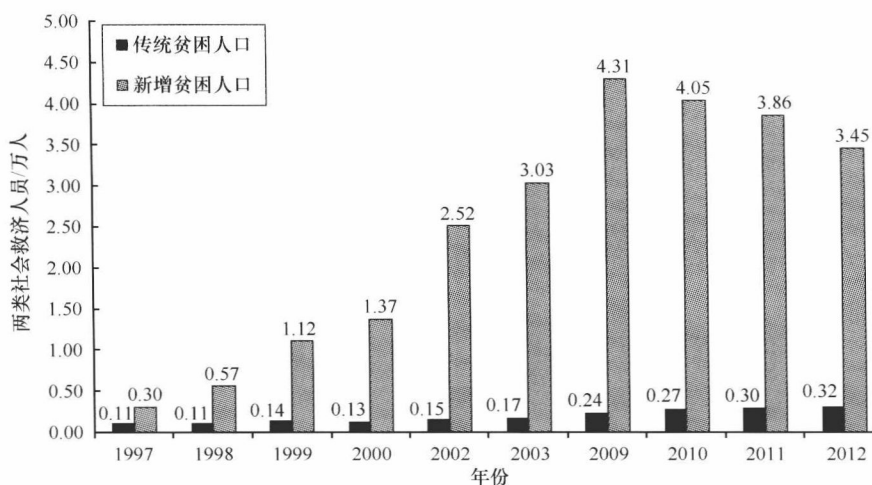


图 1.5 广州市传统和新增救济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广州市民政局，1997~2012年，作者自绘

劳动力市场、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排斥，整体生活水平低下，处于一种广义的、相对贫困的边缘化状况。农民工的贫困不仅作用于本人，还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教育和生存环境，进而形成“贫困的再生产”。中国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用1998年全国31个主要城市调查数据计算了全国流动人口平均贫困发生率为15.2%，按照总流动人口1.4亿，流动贫困人口的规模约2100万。

（四）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性体现

在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分异重构的过程，各种类型的人群在不同地域聚居的格局也已形成。城市贫困人口由于迁居能力有限，已经出现在城市特定邻里集中和固化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性已经体现，并将不断强化，这启示地理学者需深入分析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贫困研究起源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地理学和规划学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才逐渐关注此类主题。目前研究成果都集中在贫困问题和人口阶层本身，忽视了贫困问题向空间的转化研究，忽视了贫困阶层所占据的物质空间及演化过程，以及所依托的社会空间及特征。虽然有少量研究关注贫困空间分布，但是没有能够结合城市不同层面的贫困空间分布完整系统地构建研究体系，探讨贫困问题转化到空间上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少量贫困空间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某个时间点的静态描述，缺少社会经济转型的典型时段贫困阶层空间演变的动态分析，缺乏更深入的贫困阶层聚居区的变迁、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因此，本书在综述分析国内相关理论基础上，从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出发，尝试通过指标构建和定量分析方法，把贫困问题转化到空间层面，并在不同层面深入系统地分析城市贫困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

二、概念界定

本书涉及几个关键的概念,包括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城市贫困、城市贫困空间等,分别界定如下。

(一) 贫困

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长期逐步深化和多元化的过程,由物质和经济领域的贫困(poverty)深化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内的资源缺乏和多种权利剥夺(deprivation);由达不到社会可接受最低标准的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拓展到不足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

早期,西方的贫困定义是指在一个社会中,部分社会成员或家庭的收入过低、经济条件有限,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状况,即绝对贫困。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如何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定义和度量贫困,这种与某一生活标准比较而呈现的贫困状态即是相对贫困,并探讨如何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拓展标准(Alcock, 2006)。除了收入水平的比较之外,贫困更应该包括其他生活必需品和部分参与社会基本活动的情况,这就引出了剥夺概念和研究。如果说贫困更多指收入和经济条件有限、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剥夺则指缺乏日常所需的食物、衣物、住房及室内设施,缺乏必要的教育、就业机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社会活动等(Townsend, 1987)。

国内对于贫困的认识大致包括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贫困是纯粹的物质生活困难,界定为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1991;肖文涛,1997)。第二种认为城市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主要表现为缺乏一定资源(包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关信平,1999),缺乏本应得到的平等权利(包括就业权、受教育权、住房权、医疗权等)(洪朝辉,2003),从而处于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基本生活水准之下的状况,其中知识、信息和文化的贫困更是城市贫困阶层发展的主要障碍(胡鞍钢和李春波,2001)。贫困内涵随时间不断拓展,由单一的第一种观点转向综合的第二种界定,认识到贫困不仅仅是经济学概念和物质短缺,更包括文化、精神的匮乏和部分权利的剥夺。前者是表现形式,后者才是实质所在,并且不同层面和不同时期的内涵不同,是综合性(广义和狭义之分)、具体性、相对性(绝对和相对之分)、动态性的概念(阎学文,1994)。

(二) 城市贫困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是对城市地域范围内的贫困进行研究,反映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城市贫困研究包括城市贫困的概念、测度,贫困人口规模、构成、特征,以及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贫困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反贫困行动主体、公共政策效应探讨等。

西方城市贫困研究起源于布什(Booth, 1889)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和朗特里(Rowntree, 1901)的《贫困: 城镇生活研究》, 迄今已有 100 多年的研究历史了。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西方城市社会经济领域发生重大转变, 经济全球化带来就业制度变迁, 后福特经济积累体系与地方服务业相互作用, 导致大制造业工厂中稳定的就业减少, 失业水平上升带来城市贫困人口增加; 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 福利国家的财政和保障危机带来福利项目削减, 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在范围和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减, 呈现了与传统城市贫困不同的新城市贫困问题(new urban poverty)(Mingione, 1993)。

中国情况则不尽相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中国的贫困研究历来以农村贫困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我国城市居民贫富分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城市中相当数量的居民陷入贫困境况。与计划经济时期普遍低收入水平下以“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无子女)为主体的小规模、低增长的贫困状况相比, 社会经济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来源广泛, 数量增多, 涉及面大, 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特别关注, 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

(三) 城市贫困空间

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是指系统性研究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及机制, 贫困阶层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变迁, 贫困聚居区的社会环境特征和聚居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从不同空间层次入手探讨反贫困聚居的空间政策等。其中, 既有以贫困空间分布、差异的静态描述, 又有将社会现象和若干因素联系起来的动态分析, 对城市贫困空间产生、分异和变迁做出解释性分析和动态分析。

三、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1) 本书针对转型期城市贫困空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问题, 试图构建特殊时期城市贫困问题和空间互动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不同空间层面构建城市贫困空间形成和演变的解释框架, 并侧重从制度变迁和重组、政策转变和发展角度解析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特征, 以丰富转型时期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

(2) 本书选择城市贫困阶层及其占据的物质空间为研究对象, 符合目前西方社会地理学的大研究趋势: 研究侧重点由汇总人群转变为分散的个人与小团体, 关注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特定群体; 研究更倾向于小地域地理空间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此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

(3) 本书在对贫困阶层聚居区综合现状调研、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聚居区发展变迁、形成原因和改造策略研究, 丰富了我国城市社区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居住区规划是在居住空间分异不明显、以单位制为主导的背景

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规划类型,采用统一规范和标准的规划方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地域和物质空间为主要对象的“见物不见人”的住区规划。本书通过研究居住主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转变,从居住主体空间改善需求角度出发构建聚居区改造策略,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区规划研究和编制提供新的方向、拓展新的思路。

(二) 实践意义

(1) 本书选择既有 2000 多年文化底蕴又是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作为实例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一方面,广州市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方经济繁荣的商贸中心,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贫困问题是和工业中心城市相似,还是另有其他新的特点,值得理论和实践探讨,并对商贸中心类城市的发展有启示作用;另一方面,广州市处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核心位置,对于以外来农民工为代表的贫困阶层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对于深入认识和解决大都市城市贫困问题具有典型意义。

(2) 在化解贫困空间的行动研究中,本书回顾了中国低收入住房政策、社区改造实施和存在问题,并结合国外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及实践,为新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建议,对指导贫困和低收入社区建设和更新改造工作具有实践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城市贫困研究述评

城市贫困是与社会发展伴生的现象,与发展研究关系密切,借鉴胡格伟尔特(Hoogvelt)《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的叙述结构和沈红(2000)对我国乡村贫困问题研究述评,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放到“过程-互动-行动”(process-interaction-action)的框架下,按照文章主体内容对文献进行分类。本书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研究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和贫困阶层聚居区研究。为了更清楚地梳理重点内容,本章分城市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空间两个内容来述评文献。

作为过程的研究:过程研究是整个研究的基础,述评城市贫困的概念、测度、特征;述评城市贫困阶层聚居区的界定、社会经济和空间分布特征。

作为互动的研究:相对过程研究以静态描述为主,互动研究更注意将社会现象和若干因素联系起来,对城市贫困产生和发展做出解释性分析和动态分析,包括城市贫困问题的区域差异、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重组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问题的形成原因,贫困阶层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变迁,贫困聚居的社会环境和聚居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作为行动的研究:主要指反贫困行动主体和行动措施探讨。缓解贫困的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学领域,化解贫困阶层聚居则从不同空间层次入手探讨空间措施,如城市低收入住房政策、调控居住空间分异、聚居区升级改造等。

一、国外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和消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贫困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如果从英国的布什(Booth)于1889年出版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朗特里(Rowntree)于1901年出版《贫困:城镇生活研究》算起,迄今人类对此已经有100多年的研究历史了。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重组和社会变迁,学术界又掀起了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热潮。西方国家社会经济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全球化带来就业制度变迁,后福特经济积累体系与地方服务业相互作用,导致大制造业工厂中稳定的就业减少,失业水平上升带来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福利国家的财政和保障危机带来福利项目削减,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在范围和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减,导致与传统贫困不同的新城市贫困问题凸现(Mingione, 1993)。

(一) 作为过程的研究

1. 贫困和剥夺的概念

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长期逐步深化和多元化的过程,由物质和经济领域的贫困(Townsend, 1979; 世界银行, 1990; Scott, 1994)深化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内的资源缺乏和多种权利剥夺(mutual deprivation)(Marshall, 1978;

Alcock, 2006; Oppenheim, 1993; 阿马蒂亚·森, 2001)。虽然贫困和剥夺两个概念长期以来交叉使用,但是学术界也在不断争论和辨析两者的含义(Nolan and Whelan, 1996)。

贫困指收入和经济条件有限,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剥夺指个人、家庭或群体所在社区处于缺乏食物、衣物,住房条件差,缺乏教育、就业机会、社会服务和参与等综合不利状况(Townsend, 1987)。帕斯内(Pacione)认为剥夺的内涵比贫困丰富,是一个更加广泛检测社会经济状况的概念,贫困只是这个概念体系中的核心部分(Pacione, 2003)(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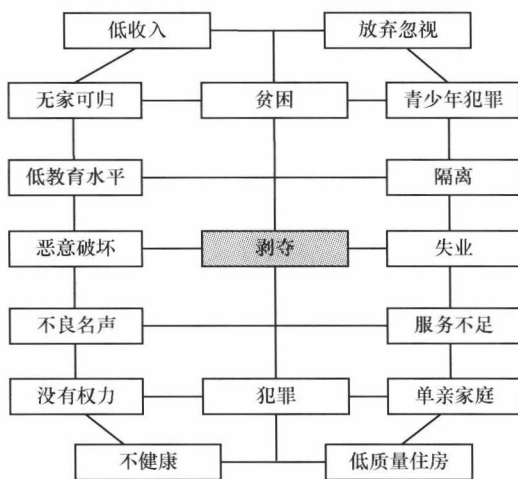


图 1.6 剥夺的内涵
(Pacione, 2003)

2. 城市贫困和剥夺的测度

城市贫困的定义包含越来越多的因素和变量,明显造成定量评估越来越困难,因而在对贫困测度和分析时,必须考虑不同城市、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背景,制定不同的贫困标准。

1) 贫困测度

贫困测度主要分为贫困线测定和贫困度量。

“贫困线”是指度量贫困而制定的、针对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或相对社会中等生活水平的差距所作的定量化的界定。国外专门探讨如何测定贫困线的资料并不多见，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阐述某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论著，另一类是综合介绍各种测定方法并加以评价的著作（唐均，1998）。贫困线的测定从多种角度进行，大多数研究采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二分法（Alcock, 2006），也有拓展为三分法，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或者“决定性贫困”“基本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莫泰基，1993）。本节对第一类方法进行综述。

城市绝对贫困标准：建立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也称为客观定义。主要方法如下。

（1）标准预算法：朗特里（Rowntree, 1901）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最早使用此法，后来英国学者阿尔柯克（Alcock, 2006）完善为标准预算法（budget standard），从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出发，折算成市场价格，该金额就是绝对贫困线。

（2）恩格尔定律法：美国学者奥珊斯基（Orshansky, 1969）在其著作《如何度量贫困》（*How Poverty is Measured*）中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30%以上用于食品开支就是贫困。联合国提出了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国际粮农组织则确定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加拿大就是用衣食住的开支比例62%为贫困线标准。

（3）世界银行标准：①以1美元/天的贫困线为基础——或者更精确地说，是1993年购买力平价换算的1.08美元/天，是发展中国家或农村地区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②2美元/天（实际上是2.15美元）的贫困线通常用于代表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线。虽然美元是广泛流动货币，但是货币汇率和实际购买力指标换算影响了这个标准在不同国家的诠释。

城市相对贫困标准：建立在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通常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也称为主观定义。主要方法如下。

（1）国际贫困线法：是以家庭月均收入的某个比例作为地区的贫困线，社会救济标准可以根据社会总体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世界银行把收入等于（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把低于平均水平50%的家庭列为相对贫困家庭。

（2）收入等份定义法：首先把国民按收入分成几个（通常是5个或10个）等份，辅以基尼系数进行差异比较，从而确定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为贫困人口；再根据这个百分比，利用家庭收入调查资料，求出贫困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0%为最高收入户，10%为次高收入户，60%为中等收入户，10%为次低收入户，10%为最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即相对贫困户，最低收入5%的“困难户”即绝对贫困户。

除了贫困线, 贫困度量的基础性指标还包括: ①贫困发生率, 也称贫困人口指数 (head-count index), 用来衡量城市人口中生活水平低于城市贫困线的人口比例; ②城市贫困距指数 (poverty gap index) 和城市贫困深度 (人均距数) 指数, 分别用来衡量城市贫困人口收入缺口 (即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 的综合水平和平均水平 (吴碧英, 2004)。但是基本指标没有考虑地区和贫困个体之间的差异, 而最有效的反贫困思路和做法是针对不同程度的贫困, 给予相应的社会救助, 使每一位贫困者在得到救助后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经济生活水准。贫困的标准化度量指标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标准化指标通常采用福利加权数 (福利方程)、森贫困指数 (Sen) 和加权贫困距指数 FGT 等。

2) 剥夺的度量

从内容看, 剥夺分为物质和社会两类, 前者较容易度量, 通常是指饮食、健康、衣服、住房室内设施和室外环境等方面; 后者难界定和度量, 指不能拥有正常的家庭或者社会关系 (Noble et al., 2006)。从对象看, 可以分为个体剥夺 (individual deprivation) 和地域剥夺 (area deprivation), 剥夺是由个体经历的, 通过测度个体的剥夺可以测度地域的剥夺。

伴随贫困内涵“由单纯物质匮乏向多种权利剥夺”的拓展, 发达国家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贫困可能更是一种社会现象, 应该主要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等多重角度出发, 而限于经济学研究, 所以贫困的测度已经超出了单纯物质的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剥夺指标 (deprivation indicators)。汤森较早提出了剥夺指标法, 主要包括物质和社会两类 13 个指标 (Townsend, 1987; Alcock, 2006);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格拉斯哥市根据人口普查中的数据选取了与住房、就业、家庭特征有关的 10 个指标进行研究 (Rae, 1983); 博若德维 (Broadway and Jesty, 1998) 在对加拿大内城剥夺研究中选取了失业率、教育水平 (15 岁以上受教育少于 9 年的比例) 和低收入家庭比例 3 个指标, 比较 1981 ~ 1991 年 22 个大城市剥夺水平的变化。帕斯内 (Pacione, 2003) 认为剥夺和多重剥夺是一个用来广泛检测社会经济问题的框架, 并通过地区的社会经济指标揭示城市贫困和社会问题加剧, 以及这些问题在特定空间的集聚。

剥夺指标体系包含两个部分: 剥夺涉及的若干方面 (domains), 如环境、教育、收入和就业 (Pacione, 2003); 每个方面包含相互独立的指标 (indicator), 避免交叉影响, 直接及时反映问题。汤森 (Townsend) 最早提出的剥夺指标体系是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 包含物质和社会两大方面、共计 13 个指标 (Townsend, 1987) (表 1.1)。后继研究不断完善指标体系, 涵盖收入、就业、住房 (居住环境)、教育、疾病和健康、犯罪等方面。

指标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较多依赖于数据本身的可获得性。指标一般来源于普查数据, 虽然它们能够提供小地域的综合信息, 但是诺贝 (Noble) 指出普查数据很少包含与剥夺直接相关的数据; 间隔 10 年才采集一次, 时效性差, 发布时间慢 (Noble et al., 2006)。另外, 还可以采用地方或行政管理中专门调查的数据, 以弥补普查数据的不足。但是指标并非越多越好, 必须基于清晰的概念或理论框架, 明确要研究的主体